

印度仿制药:穷人的福音 药企的死敌

据《法制日报》5月8日消息,我国一名在印度留学的硕士生,因归国后做起了印度抗癌药品的代购生意,被以涉嫌销售假药罪依法批准逮捕。为何代购药品会和“卖假药”扯上关系呢?

“印度抗癌药品”,就是“印度仿制药”,印度仿制药地位尴尬,不具备专利(有的以地下渠道进入中国市场),低廉的价格为贫苦人民带去希望,也给制药巨头造成极大的利益损失。

仿制药不等于假药, 药品专利可能“杀死穷人”

流入中国的印度药有两种:一种是印度仿制药;一种是假冒的印度仿制药。对于“正宗”的印度仿制药,即与专利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适应症上几乎相同,但不受专利束缚的正规药物。由于无需支付专利费,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20%-40%,个别品种甚至相差10倍以上。印度一直有着“世界药房”之称,仿制药产业十分发达,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昂贵药品一经上市,印度制药企业在本国专利法保护下可以仿制同类产品。

仿制药质优价廉,扼杀仿制药会断送

患病贫民的生命

由于没有对药品化学成分的专利保护,印度的药品价格为全球最低。对于国际人道组织而言,诸如无国界医生、全球基金、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等组织,都不得不依赖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来运作项目。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指出,该组织有80%的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从印度购买。

印度仿制药价廉质优,对于不幸罹患癌症等花费巨大、极难治愈的重大疾病的穷人而言,意义重大。如果一味强调创新药的专利,势必会间接造成“杀死穷人”的局面。

矛盾之处:没有创新药,哪来仿制药?

据美联社报道,印度最高法院近日驳回瑞士制药巨头诺华公司对改进后的抗癌新药格列卫(Glivec)专利保护的要求。认为印度本土仿制的癌症特效药可以继续售卖。

据介绍,这种药品主要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恶性胃肠道间质肿瘤,是现阶段一种重要的抗癌药物,目前已在40个国家获得专利权。然而在印度,格列卫却并未被授予专利。依据印度2005年才

修改的专利法,印度只支持1995年后开发的新药,不支持现有药物混合或者衍生药物申请专利。另一方面,印度也在生产自己的格列卫。这种仿制药在效果上,和诺华公司格列卫区别不大。诺华“格列卫”一个月治疗花费高达4000美元,而印度仿制药仅需73美元。

仿制药冲击制药巨头利益, 利益受损则新药研制受阻

过去,一般认为研发一个新药,平均花费大概10亿美元左右。不过最近的一项数据表明,开发一个新药的费用远不止这些,像阿斯利康(全球性制药公司),在1997年到2011年间研发花费大概在590亿美元,而在这期间只批准了5个新药,平均算起来每个新药花费高达118亿美元。下面表格所列出的每个新药的花费,包含了很多研发失败的项目,如果只是以一个成功上市的新药来算,其研发费用会低于这个数字。

公司	批准新药数量 (1997-2011)	平均每个新药花费	总共研发花费 (1997-2011)
阿斯利康	5	118亿美元	590亿美元
葛兰泰克	10	82亿美元	817亿美元
惠诺森	8	79亿美元	633亿美元
罗氏	11	78亿美元	858亿美元
辉瑞	14	77亿美元	1082亿美元
强生	15	59亿美元	883亿美元
礼来	11	46亿美元	503亿美元
雅培	8	45亿美元	360亿美元
默克	16	42亿美元	674亿美元
百时美施贵宝	11	42亿美元	467亿美元
诺华	21	40亿美元	836亿美元
安进	9	37亿美元	332亿美元

各大医药公司研发新药的巨额花费

大型制药公司认为,他们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来支撑高投入的研发。而仿制药生产商则不同,他们通常只是复制那些专利过期的药物。

一个逻辑上的矛盾之处在于:仿制药确实可使得更多的穷人获得救助,但因此对制药巨头产生的冲击如果足够大,则会影响创新药的研发和生产,其中的坏影响又会反过来作用到穷人身上。

腾讯网《今日话题》第2423期

日本惊现二战前四大征兆

《人民日报》近日刊登长篇学者文章,阐述日本如何利用殖民侵略“窃占”钓鱼岛,最后强调“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因为琉球(现冲绳一带)在历史上也不是日本的,这引起日本极度不安。其实,该文章是针对日本一系列一错再错行为,给予其警醒。目前,日本存在着与发动二战前惊人相似的征兆。

相似一:频繁更换首相

现在:从2003年起,日本10年间换了8个首相,外债堆积,经济萧条,失业率屡次刷新纪录,最高曾达5.7%,社会矛盾愈发突出。

二战前:二战前的10年,日本更换了12个首相,当时,经济迎来大萧条,为了转移社会矛盾,以军阀冈村宁次、东条英机、土肥原为代表的日本军部策划并发动战争。

相似二:散布舆论谣言

现在:日本右翼分子利用国际场合发表言论歪曲历史,最著名的就是石原慎太郎2012年制造的“购买钓鱼岛”闹剧。

二战前:松冈洋右,外号“五万言先生”。松冈洋右在“九一八”事变前多次担任日本驻中国领事,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日本侵华造舆论。

相似三:冲破秩序阻碍

现在:日本执政党等政党多次声称,要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和第九十六条关于放弃宣战权力等条款,从而达到增加兵力、扩充军备、有权发起战争等目的。

二战前: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战后战胜的协约国在法国巴黎所签订的合约,构成战后帝国主义在欧洲和中东的统治秩序。1931年,日本冲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相似四:大力发展军力

现在:日本近年连续向西南方向增兵,目前全国军事人员已扩充到约30万,大大超越和平宪法规定的“总兵力不得超过10万”;各类军舰近150艘,是和平宪法规定的“军舰数量不得超过30艘”的5倍。

二战前: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全国只有不到20万兵力。之后,日本开始大量扩充兵员,到1941年达到250多万人;二战中日本共生产坦克5000多辆、航母17艘、战列舰2艘、潜艇147艘。

《法制晚报》

3000元名包 成本价100元

价格上万的包只赚了瓶矿泉水钱

“动辄几千、上万的包却仅仅赚了两瓶矿泉水的钱,利润薄得就像一张纸!”东莞慧达手袋厂行政总监张洁达如此坦言。而这几乎成了许多奢侈品代工厂共同的声音。

这家企业代工COACH、PRADA、ARMANI、BURBERRY等七八个品牌,年产160万-170万个奢侈品牌包。

张洁达称,做奢侈品代工的毛利不会超过10个点。比如说,一个售价3000元的COACH包,我们卖给香港贸易公司120元,成本占100元,其中45元为材料成本、20元为人工成本、35元为水电租金等成本,一个包只有20元可赚。这是较好的情况,有时成本控制不好,一个包经常只赚5元人民币,也就是两瓶矿泉水的钱。



被抓获的美方人员瑞安·福格尔

5月14日,俄联邦安全局证实,美驻俄大使馆一外交官涉嫌征募俄情报官员为中情局工作,遭俄反间谍人员当场抓获。俄已将此入移交美使馆,要求他立即离境。美国方面回应称,只是官员被短暂扣留。

分析人士认为,冷战结束20多年来,美俄间谍活动从未间断,这是冷战思维延续。2010年,俄罗斯美女间谍查普曼在

广州市番禺区一家手袋厂的总经理石达贵分析说,一个奢侈品牌包,厂家以20-30美元结单卖出,市场的最终售价每个手袋会高达400-500美元,这其中,贸易公司起到监管作用,大概拿走10%-20%的利润,除掉20多个点的税后,品牌商分得40%-50%的利润。品牌商靠品牌名字赚大钱,品牌名气越大,分得的利润比例就越高,但实际上成本甚至不到百分之十。

“产地游戏只为迎合消费者”

据业内人士介绍,消费者追崇奢侈品最主要的是“产地效应”,即哪里制造生产的,这也是企业打造奢侈品的重要卖点。特别是国内一些不成熟的消费者购买奢侈品就是为了上面印着的“Made in Italy”或者“Made in France”的标签。

其实,按照各国的规定,产品在哪个国

美 间谍”策反俄特工被抓现行

美国落网曾轰动世界。

英国媒体透露,被福格尔招募的是俄联邦安全局(FSB)高级探员,负责收集高加索地区反恐情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元凶塔梅兰就是其工作范围。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还公布了福格尔被抓时携带的一份文件,文件名为《征募俄罗斯公民指南》。文件写道,“有人对你的职业水准印象深刻,高度重视你和我们的合作,这是预付款。”

文件称,预付款是10万美元,长期合作的话,年薪可达100万美元,并且文件承诺将在获得有用信息后支付额外酬劳。

俄情报部门一高官指出,他对CIA使用如此“落后”的手法表示不屑,“从被抓特工身上查获专门的技术装备、被招募俄公民书面指南、大笔钱款和易容技术说明,CIA仍然使用二三十年前对付苏联的间谍手法。”

背景

美曾俘获俄“千面女王”

美俄间谍战历史悠久。1985年,美曾发现驻俄使馆墙壁里塞满监听设备,不得不将这座建筑重建。

两国因间谍案引发世界关注,最近的一次是在2010年。当时,两名FBI特工破获了潜伏在美国多年的俄罗斯特工网,抓捕12名俄间谍,其中包括有“千面女王”之称的美女间谍安娜·查普曼。不过,两国在冷战时就有一个“友好”的传统,即互换被俘间谍。2010年,总理普京签署命令,用4名为西方做间谍被定罪的俄国人换回被俘的10名特工,这是两国间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间谍交换行动。

当然美俄间谍还是有一定生命危险的。1985年,一名美国军官在东德从事间谍活动时,被前苏联哨兵击毙。

《新京报》2013.5.16文 / 高美

外国人离开中国不只因污染

香港《南华早报》5月13日文章称,关于为何一些外籍人士决定离开内地以及为何选择现在离开,大量文章和博客都在指责空气污染是主要原因。

空气污染真的是他们考虑离开的最主要原因吗?中国欧盟商会最近对媒体称,北京等内地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已成为很多跨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显然,这足以令许多外籍人士离境。

环境问题是人们选择在哪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我认为,员工通常更关心收入和职业前景。

外籍人士接二连三离开中国的一个原

因是,他们当中许多人已在中国工作多年,因此有理由认为他们到了必须为未来职业生涯作出决定的阶段。跨国企业派人驻外的期限通常是四五年。当这些人员驻外超过这个时间时,雇主常试图将他们“本土化”。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节省成本,比如取消住房津贴等关键福利。

那些不愿被“本土化”的员工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投靠新公司,以便维持高质量的驻外生活;二是收拾东西回家。如果是后者,员工通常会得到一次性搬迁费。

中国已今非昔比。在北京、上海等一

线城市,如今工作中的竞争非常激烈。语言也是迫使外籍员工离开的一个因素。许多跨国公司雇用懂外语的当地人,外籍员工的晋升机会因此减少。

此外,很多西方企业近几年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严重影响,在外派员工时自然变得谨慎。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成为比空气污染更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离不开中国是你自己的决定,离开的原因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因素,而不是空气污染这个简单的借口。

《环球时报》2013.5.14

文 / 乔治·陈 译 / 田颖